

“印学话西泠”：论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和学术意识

吴彦颐

摘要：研究印学，必然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西泠印社的印学构成所涉及的领域绝非单一，而是通过多元或多样性积极开拓学术新域。2020年11月，陈振濂先生在“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上提出新的概念——“大印学”，此后就“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抒发己见，顺应时代潮流对当代印学研究的引领和拓展。本文以西泠印社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视角观照“大印学”，试图运用综合的方法对其研究范围和学术意识两大块进行不同维度和层面的探讨。前者包括对印学基础理论与篆刻技法的研究、对印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西泠印社史的研究三个部分；后者体现在问题意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学科意识四个方面；旨在管窥百年名社在印学发展中的转型及其蕴含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泠印社 大印学 研究范围 学术意识

所谓印学，就是研究“印”的发生、发展、转变以及技法、风格、形式诸原理和规律的学问。研究印学，决计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作为西泠印社的宗旨之一，“研究印学”并不只是专门探讨篆刻艺术之技法、发展历史及各篆刻流派艺术理论，而是涵盖了从古玺、汉印到明清流派篆刻直至近现代篆刻的所有内容。与篆刻艺术创作相比，“印学”着重于研究印学史、印学理论、印学批评，具有明显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著的方式展开。谈印学必然关涉篆刻艺术创作，但唯其如此，也不能等同于印学的建立。说到底，理论与创作相伴而生，缺一不可。西泠印社作为印学重镇和殿堂，它不仅关系着印学学科的发展，也关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2020年11月，陈振濂先生在“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上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大印学。”^①“大印学”是对传统印学的继承和拓展，也是西泠印社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一种学术态度，更有着意于“学术立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文化意义上的考量。因此，本文撰述的宗旨，既以西泠印社为研究对象，又从宏观视角观照“大印学”，试图运用综合的方法对其研究范围和学术意识进行不同维度和层面的探讨，以管窥百年名社在印学发展中的转型及其蕴含的重要意义。

^① 西泠印社编：《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总序，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该序由陈振濂先生撰写，时间是2020年8月，但会议的召开时间是2020年11月，故作一说明。

一、对“印学”相关概念的阐释

“印学”的内涵广阔复杂，包含不同方面和层面，其与“篆刻学”“金石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之间既有交叉，又有重叠，相互影响。然而，长期困扰我们的是，人们对于上述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含混而不确定。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研究者和后学对这些概念不探讨清楚，印学的研究工作就无法展开。基于此，有必要对印学的相关概念作一阐释。

（一）“印学”与“篆刻学”的概念纠葛

关于“印学”与“篆刻学”的概念，陈振濂先生于1997年在天津组织召开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时做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他认为，“对古玺汉印，我们只提‘印学’，而对明清篆刻，才提‘篆刻学’；过去沙孟海先生著书，曰‘印学史’而不曰‘篆刻史’”^①。基于这样的划分，笔者尝试从沙孟海的印学著作中寻找答案。1927年，沙孟海撰有《印学概论》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2号。该文虽以“概论”为名，但却有“记史”的味道。他以宋元为界，将印学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上篇是创制时期，下篇是游艺时期。前者论述以制度为主，后者论述以作家为序次。^②此后，沙孟海于1963年起草《印学史》，1984年7月定稿。将二者相比较，可以发现，《印学史》的上编和下编分别以印章旧制和印学体系相称。经细微观察，该划分仍然沿袭的是《印学概论》中的两大时期，划分的依据和出发点也相一致，只是表述略有不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学史》的第十七章是“印学的形成”。在该章开篇，沙氏指出：“印章的发明与使用，历史悠久，上面已说过。由实用的印章逐步变成美术作品，那是唐以后的事。再进一步而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即印学，亦称篆刻学，更是近七、八百年的事。”^③这段话为我们理解印学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细加分析，可得知以下信息：第一，一部印学史，前半期是印章史，后半期才是篆刻艺术史。第二，“印学”等同于“篆刻学”是有时间限制的。以沙氏起草《印学史》的时间向前推七八百年是宋代。也就是说，宋以后的“印学”也称“篆刻学”在逻辑上能成立。究其因，在于篆刻真正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雅玩，进而转向艺术审美形态，其转折期就是在元明时代。由是观之，沙孟海先生的见解，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查阅了不同版本的《中国篆刻史》，著者在“前言”或是“绪论”部分都会对“印学史”“印章史”“篆刻史”作一辨析。比如，叶一苇认为：“印学史：囊括古代玺印与文人篆刻艺术；印章史：专述历代印章的发展与演变；篆刻史：着重叙述古玺印的艺术性与篆刻艺术的产生、

^① 对于“印学”还是“篆刻学”的问题，陈振濂先生请教过其恩师沙孟海，沙说：“‘印学’的范围大，可以包括篆刻；而一定名篆刻，则古玺汉印无处着落，在学术上也不太严格。”陈说：“我想也对，总不见得写历史从明清时代开始吧？倘若此，则大量古玺汉印直到唐宋元明清官印怎么办？故尔用‘印学’名称，应该是更妥当一些的。”参见陈振濂：《关于篆刻学科建设诸问题——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学术总结》，见李立中编《思想的轨迹：陈振濂教授学术演讲录》（下），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

^② 徐清：《沙孟海学术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35—336页。

^③ 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89页。

发展。”^①还有版本认为：“印章史，主要包括印章的用途、名称、文字、材料、形式以及制度的演变；篆刻艺术史，主要指印章的艺术化过程，包括制印过程中篆法、章法、刀法的发展变化，也包括印章艺术内容的不断扩展升华；印学史，主要包括历代对印章、印制、篆刻艺术进行理论探索的历程和理论研究的成就。”^②概言之，“印学”的范围包括历代印章和篆刻艺术。陈振濂先生的观点和阐释很有说服力，在他看来：“与集中于元、明、清的文人篆刻流派相比，‘印学’要广涉上古至中古的众多文物，比如古玺汉印等。……提‘研究印学’，涵盖了篆刻艺术从古玺汉印（古印章）到明清流派篆刻（近代篆刻创作）的所有内容，而不仅仅是限于篆刻创作而已。”^③由此推论，“印学”和“篆刻学”的关系是前者包容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

（二）“印学”与“金石学”的深厚渊源

西泠印社的宗旨不只是“研究印学”，还有“保存金石”。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侧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用以考订经史、阐发义例。金石学形成于北宋，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始于清末民初。北宋从帝王到文人士大夫收藏和研究金石的风气十分浓厚，诸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著作标志着金石学的成形。清嘉庆、道光年间，金石学复兴。彼时，古玺印大量出土，又以金属印居多，铜印占了绝大多数。正因为金石学崇尚古代铜器、石刻的趣味，又专门研究考证铭刻在钟鼎彝器、碑版、玺印、封泥、砖瓦上的铭文，从中获取历史信息，同时极大地扩展了收藏文化。所以，“印学”与“金石学”气息相通。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印学”与“金石学”的关系，而必须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复杂性。有学者认为：“以学术源流论之，篆刻研究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确从属于金石学。”^④究其因由，主要是清代乾嘉以后，诸多学者非常重视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以致搜访拓集石刻碑版的风气极为兴盛。此一时期，关于古代印章、古代封泥的收集和研究也不断深入，推动了金石学、古文字学的勃兴。这一风气迅速发展，直接影响到篆刻界，于是印坛别开生面，印人锐意变法，篆刻艺术成果不断问世。查阅20世纪上半叶的金石学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与金石篆刻、钟鼎彝器相关的古文字研究和金石考据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研究把古玺印作为考察的对象，可见其从最初就与金石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金石学视角下的印学研究过于强调史学因素，而忽视了其对于艺术和审美观念的探索。遗憾的是，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加之学科分类转型，“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已不复存在”^⑤。

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立足于学科构建，其著作《中国金石学概论》不仅探讨了金石学的定义、范围与历史，同时还指出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的搜集、保存、流传等处置方法，对后世金石学研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在“篆刻”与“金石学”的区分上，他如是说：“余尝闻之

① 叶一苇：《中国篆刻史》前言，西泠印社2000年版。

② 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③ 陈振濂：《篆刻·印学·金石学》，《中国书画》2011年第5期，第120页。

④ 祝帅：《从西学东渐到书法转型》，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人曰,‘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指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之乎视金石学矣……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①巧合的是,李健在《金石篆刻研究》一书中也指出:“金石家不必尽能治印,而以治印名家者,莫不从事金石之探讨。”^②由此可知,“刻印”与“研究金石”根本不是一回事,把“印家”等同于“金石家”,这样的见解显然是片面的。

据史料记载,“在西泠印社八十大庆(1983)之际,沙孟海以社长之尊毅然对长期以来以‘金石’指代‘篆刻’,造成‘金石学’与‘印学’混淆的传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在当时也曾引起印社中老辈社员的不理解,并且引发了一些辩论”^③。可以想见,沙孟海在印学学科的独立上恪守严谨的学术立场,保持锐利的批评锋芒,坚持己见,体现出一位学者大师应有的风骨和气度。为了阐明“金石学”与“印学”的关系,陈振濂先生予以双重诠释,他说:“‘金石学’是一个范围更大的学问,而‘印学’只是‘金石学’中一个很小的支脉。提倡‘金石’,其实是在为‘印学’提供一个厚实而宽广的学术支撑点。”^④这一观点为后面的论述起到一种清晰的引领作用。

(三)“大印学”概念的提出

如前所述,“大印学”一词是陈振濂先生于2020年11月15日在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闭幕式上首次提出来的概念。2021年4月23日,在西泠印社辛丑春季雅集“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陈振濂先生发表总结讲话,并对“大印学”概念的产生阐述其理念。^⑤2021年11月11日,西泠印社举行“大印学(1)——两宋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年11月9日,陈振濂先生在“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大印学”立身的两个基点,以及西泠印社的多元化学术拓展潜能。2023年3月28日,陈振濂先生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作“在‘大印学’中寻找世界印章史视野下的中国”主旨发言。这些为我们深入研究“大印学”指明了方向,深化和拓展了传统印学的新领域。

笔者认为,“大印学”之“大”,在于其文化范畴之广。相较于传统印学注重介绍印人、印作、印谱以及印史考证之外,它更强调扎根于传统印学基础上的超越,也就是对传统印学进行“活化”,不断激发传统印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活态基因,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助推力,以此推进整个印学界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传统印学中材料和技能的研究。诚如陈振濂先生所言,“‘大印学’中的印学这个

① 马衡:《谈刻印》,原载于《说文月刊》1944年四卷合刊本,后收录于《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0页。

② 李健:《金石篆刻研究》,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3年版,第1页。

③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页。

④ 陈振濂:《篆刻·印学·金石学》,《中国书画》2011年第5期,第121页。

⑤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2—10页。

概念不仅仅是文献和学术，还包括我们的材料和技能”^①。因为，“印章形式构成的另外一些条件如印泥、印钮、刻刀、款识等，虽不是印面形式本身的课题，但它们对印章艺术的发展仍然是重要的因素”^②。此外，“关于印学中篆刻的技法和过去制印用的技法方面的研究在今天几乎是空缺的”^③，必须引起重视。笔者查阅历年印学峰会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不难发现，2012年西泠印社“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即有对“篆刻创作技法”和“工具材料”的探讨；第五届和第六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亦有“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专题。其次，对传统印学基础上金石学、碑帖学、传拓学、古文字学等的研究。西泠印社以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复兴当代金石学，于2009年举办“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在第四届印学峰会中有“金石文字与谱籍”专题；第五届和第六届峰会均有“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专题；并于2021年举办“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最后，对世界印章的研究。从2016年始，西泠印社相继启动“世界图纹与印记”“域外印章”等研究专题，以此推动印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振濂先生对“大印学”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发展思路，且设定了相应的发展目标：第一，推进“砚铭文化”；第二，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第三，倡导“拓片题跋”；第四，“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④可见，“大印学”体格丰满，血脉贯通，是一种以内化外、溯源开新的自我更生。

总而言之，“大印学”的内围是印章本体，外围则是在其基础上探索新的艺术现象，并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念主导下加以创新。也就是说，大印学“既要具有‘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印学概念，也需要有‘保存印学’基础之上推动‘传统印学’再往前跨越一步的东西”^⑤。毋庸置疑，陈振濂先生提出的“大印学”不失为一种具有远见的高层次思考。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式的学科定位，这一定位要求印学研究者对传统印学做进一步探索，并对其作反思性、前瞻性的谋划，以此拓展印学的研究空间，扩大了印学研究的范围。

二、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

前述所言，印学是研究“印”的一门学问。西泠印社作为印学高地，其打造的“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当属高端的引领性会议，从2005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六届。除此之外，西泠印社还策划了数场专题性极强的学术研讨会。笔者对近20年来西泠印社主办的大型学术会议的研究专题大致做一整理与归纳，以清眉目，详见下表：

①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5页。

②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③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4页。

④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7—8页。

⑤ 《陈振濂先生在“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学术总结》，《西泠艺丛》2022年第12期，第72页。

表1 2005年至今西泠印社主办大型学术会议统计表

时间	会议名称	研究专题
2005年	首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篆刻学学科研究 2.印学史研究 3.吴昌硕与赵之谦研究 4.西泠印社史研究 5.西泠印社早期日籍社员长尾雨山研究 6.浙派研究论辩 7.近二十年西泠印社印学研究成果选
2006年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	1.早期社史研究 2.早期社员研究 3.史料介绍与人物回忆
2008年	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印文化综论 2.古玺印研究 3.篆刻流派与创作研究 4.印人专论 5.印谱与文献研究 6.域外印学专论 7.西泠印社史研究 8.相关研究
2009年	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金石学综论 2.玺印研究 3.铭文碑帖研究 4.金石著录研究 5.金石家研究 6.其他
2011年	第三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传播与传承 2.人物与交游 3.技法与审美 4.金石与名物 5.谱集与文字
2012年	西泠印社“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内容涵盖明清时期篆刻艺术流派、篆刻家、印学理论以及篆刻创作技法、收藏鉴赏、工具材料等
2014年	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玺印微探 2.印人与流派研究 3.藏印考鉴 4.金石文字与谱籍 5.篆刻创作与审美 6.印章典制与印文化传播 7.书画论札

(续表)

时间	会议名称	研究专题
2016年	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 国际学术研讨会	1.域外印章研究 2.传统图形印研究之一：器物与纹饰解读 3.传统图形印研究之二：创作与审美流变 4.非汉字印章研究 5.相关研究
2017年	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古玺印研究 2.篆刻流派与地域研究 3.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 4.印学文献研究 5.印人研究 6.域外印章研究 7.西泠印社史研究 8.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
2018年	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通览目录，主要从美术考古、印章史及艺术学的角度，对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图形纹饰、文字铭刻、汉字及非汉字印章进行考察和研究
2019年	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印谱史研究 2.印谱著录与出版 3.印学史研究 4.古玺印研究
2020年	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印人与篆刻流派研究 2.印学文献研究 3.印学观念史研究 4.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 5.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 6.玺印文字研究 7.域外印章研究 8.金石全形拓研究 9.其他
2021年	大印学(1)——“两宋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通览目录，研讨范围包括： 1.宋代金石学、金石学家研究 2.宋代金石收藏研究 3.宋代文字学研究 4.宋代碑帖研究 5.宋代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6.传统印学研究等

(续表)

时间	会议名称	研究专题
2022年	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通览目录,研讨范围包括: 1.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收藏研究 2.古印收藏史研究 3.文人篆刻收藏、印学文献与印具印材收藏史研究

由上述14次印学会议的研究专题可以看出,传统印学研究领域分工更加细化,主要是对印人、印技、印史、印谱等方面的研究,笔者将其视为印学的本体研究。从2008年开始,印学的研究领域逐渐向外扩张,出现了“域外印学专论”。2016年以后,“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关涉“域外印章研究”,彰显出一种全新的印学发展观念,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至2020年,“金石书画与鉴藏”“金石全形拓”被纳入印学研究的视野,可谓是在新领域的开拓与探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和2022年均以“大印学”为主题,分别举行“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印学收藏史”两场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拓展印学研究的疆域。可以说,上表不仅对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提供了基础和视野,同时也为印学学科建设凝练了方向,下面作具体探讨。

(一) 学科定位与边界

“大印学”有整体的宏构,包含着多个维度和层面。因此,必须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之。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研究时,既要考察印学与它的上位系统(诸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等)之间的联系,也要考察印学自身系统内部的结构,即印人、印技、印作、印论、印谱等下位系统。这是从第一个层面理解“大印学”。当然,仅仅按照上位系统和下位系统来设计“大印学”的学科体系还不够,需十分重视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印学社团,这是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以西泠印社为中心,勾画其发展脉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放眼世界、走向世界,作跨文化圈、跨地域、跨国界的考察,寻找世界印章史视野下的中国,由此引出第三个层面“域外印章研究”。这三个层面清楚地阐明了印学的学科性质,为我们理解“大印学”的学科定位做了铺垫。这一定位就是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此处所言的“其他学科”有两层意思:一是与印学相关联的学科,如金石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二是印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前者是从印学内部关系出发探讨其学科定位,后者则是从外部关系出发考虑之。厘清这一定位,其他问题就豁然开朗。

从学科角度论,任何学科边界都是以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核心。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必须在该学科范围内,但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边界的确定不能混为一谈,我们最终要看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比如,美学、考古学、图像学、符号学都要研究艺术作品,但不能说它们都是艺术学。以古玺印为例,可以从艺术学角度来探讨,也可以从美学、古文字学、金石考古学等不同侧面来分析,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目的会产生不同的学科结果。譬如,艺术家从印文的结体、印面的构成和笔画的形态等发现其艺术特色和价值;美学家用美学的方法探讨其形式美及其

法则，重在审美研究；古文字学家从印文内容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或者是字形所反映的本义考释古文字；金石考古学家则是考证、判断、鉴别印章的出土年代和分类。故而，厘清学科边界，明晰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深入透彻地探讨研究范围。

（二）研究范围

一般来说，“印学”和“印”就像“艺术学”和“艺术”的关系，二者是不同的学科路径。前者通常指学术理论，后者通常指艺术创作。然而，研究印学必须围绕“印”展开，没有印就不可能产生印学理论。当然，印学除了理论研究，其发展与篆刻艺术创作也密切相关。原因在于，创作的主体是篆刻家，因此，印人（印家）、印作（篆刻艺术作品）亦是印学关注、探讨、分析与研究的范围。

我们还可以从陈振濂先生提出的“大印学”立身的两个基点来拓宽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这两个点分别是“学科交叉”和“文明交融”，“前者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产生、开发的新兴学科领域。后者不限于中国，是站在‘世界印章史’的立场上对不同文明形态的印章、不同国家文字入印以及各领域之间的学术研究交流”^①。此二者相互融合，恰恰与沙孟海先生曾经提出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高度契合，由此体现了百年名社的重要分量。

基于上述探讨，笔者尝试把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分成三大类，其基本系统与框架如何搭建，详述如下。

1.对印学基础理论与篆刻技法的研究

（1）印学史——中外印章史研究；世界印章史研究；也可按照“文化圈”分区域研究，如东方和西方，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也可对此进行分类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

（2）印学理论——探讨印章的起源与发展，印章的分类，印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印章的形式与内容、艺术语言和风格流派；篆刻创作的过程、继承和创新。

（3）印学批评——篆刻艺术鉴赏与批评，篆刻家与艺术作品的分析；篆刻批评的标准、流行和导向；对当代篆刻家的批评。

（4）篆刻美学——根据艺术美的共性来认识与研究篆刻美的形成、发展和表现形态，从中揭示篆刻美的本质与特征、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欣赏等基本原理和规律。

（5）篆刻文献学——历史上的印论、印话、序跋、讲义、琐谈中的篆刻资料及文献；对古印谱的研究。

（6）篆刻教育学——中小学篆刻艺术教育、高等院校篆刻艺术教育、社会篆刻艺术教育。

（7）篆刻技法研究——对篆法、刀法、字法，以及对边款的研究。

^① 《陈振濂先生在“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学术总结》，《西泠艺丛》2022年第12期，第73页。

以上七个方面，特别着重于印学的历史、理论、批评、审美、教育等，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又与其他学科交叉出许多新学科。

2.对印学交叉学科的研究

(1) 印学文化学——篆刻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印学社团与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关系；西泠印社的组织架构和印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不同地域背景形成的篆刻“文化圈”。

(2) 印学社会学——印章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印章（或篆刻艺术）样式和风格生成变化的社会根源；把篆刻艺术当作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其繁荣与社会的关系；篆刻家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状态。

(3) 印学经济学——亦称印学市场学，研究篆刻艺术与市场现状；篆刻市场培育与发展；篆刻作品价格与艺术价值；古代玺印的收藏与拍卖。

(3) 印学传播学——印谱对篆刻艺术的推动；收藏家所辑印谱与篆刻家所辑印谱的区别；篆刻艺术在国内外的传承与传播。

(4) 比较印章学——比较与鉴别，共性与个性；中外印章比较研究，印材之间的比较，文字之间的比较。

(5) 金石传拓学——印学与金石传拓的关系；传拓术的流程；金石全形拓研究。

(6) 金石考古学——印学与金石考古学的关系；对玺印的考证、对封泥的考证；对古印章形制的研究；通过田野考察、挖掘，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为印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7) 古文字学——印学与古文字学的关系；对古玺文字的考证。

(8) 鉴藏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印章鉴藏的发生、发展、延宕迁变之历史脉络作一勾勒；书画用印与鉴藏用印研究。

以上八个交叉学科皆略举其要，不够完备，有些条目看似相对独立，实则相互结合与穿插的关系。所有这些交叉学科与分支学科，都极大地丰富了印学的学科体系，从而将其向纵深推进。

3.对西泠印社史的研究

百余年西泠印社史，不仅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篆刻专门史，同样又是一部宏伟的社会文化史。可以肯定地说，一部西泠印社史，在特定意义上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篆刻的缩影。若无西泠印社史，那就不能构成“大印学”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为“大印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正因为此，对西泠印社史进行回顾与追溯，是近年来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以及专题研讨会一直关注的重点。^①

令人欣喜的是，陈振濂先生独具慧眼，在20年前就将西泠印社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从学术角度去研究它的百年史，并著有《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书中对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西泠

^① 2005年，首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有“西泠印社史研究”“西泠印社早期日籍社员长尾雨山研究”专题。2006年，西泠印社举办“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2008年和2017年的第二届、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亦有“西泠印社史研究”专题。

印社与近现代印学史、西泠印社的大师巨匠、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名人、西泠印社与国际印学交流、关于西泠印社史研究——“西泠学”^①做了深入探索与阐明，还勾画出“西泠学”体系的大致轮廓：

- (1) 西泠印社与篆刻理论史或印学史
- (2) 西泠印社与金石学史
- (3) 西泠印社与近代学术史
- (4) 西泠印社与近代书画史
- (5) 西泠印社与近代社会史
- (6) 西泠印社与民国政治史
- (7) 西泠印社与清末民初思想史
- (8) 西泠印社与沪、浙地域文化史
- (9) 西泠印社与近代社团组织史
- (10) 西泠印社与艺术经济市场史
- (11) 西泠印社与近代艺术展览史
- (12) 西泠印社与文人士大夫聚会形式演变史
- (13) 西泠印社与出版印刷史
- (14) 西泠印社与印泥制作史
- (15) 西泠印社与收藏史
- (16) 西泠印社与篆刻专题创作史
- (17) 西泠印社与园林景观建造史
- (18) 西泠印社与西湖博览会史
- (19) 西泠印社与浙江图书馆、博物馆建设史
- (20) 西泠印社与国际交流史^②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会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西泠印社也不例外。从上述选题可以窥见，西泠印社与不同方向、不同学科跨门共生、融合发展，催生出一个个新兴且富于生命力的新学科，这是学术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若对上述选题做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研究，足以扩大西泠印社史的研究界域，在学术上更有朝气。同样，上述选题所研究的内容得到新的发展，还会延伸出新的方向。那么，“西泠学”就会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学科群。当然，这是一个重大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需要学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① 陈振濂先生在《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中，以“导论”代“前言”的方式，对百年西泠的体系、结构、框架做了严密的思考，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参见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1—47页。亦可参见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目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

^②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138页。

三、西泠印社的印学学术意识

学术意识是指学术研究机构或研究者个人有意识的行为活动责任，即对学术研究有广阔的视野、有明晰的方向、有理性的思考、有科学的方法、有探索的精神。西泠印社具有120年历史，其印学研究蕴含着自觉的学术意识，主要包括问题意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学科意识四个方面，下面逐一述之。

（一）问题意识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着眼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问题意识，善于寻找和挖掘事物发展的真相，在质疑和批判中做有深度的追问，从中获取研究的真谛。

西泠印社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经历过转型，它促使当代印学必须从变革着的传统旧方式出发，也就是在传统印学的基础上超越，从而紧跟时代步伐，而不是做陈旧的、老套的研究。陈振濂先生在西泠印社115周年社庆之际，就明确指出“学术研究讲究问题意识”，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有没有‘问题’的存在？如果没有，那就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如果根据一个事例能带出一个‘问题’背景，那就有了生发的价值”。^①这为我们在学术探索之路上继续前行树立了典范。在西泠印社百余年发展历程中，他对西泠印社史的认识越发清晰，对几个关键阶段进行发问：（1）西泠印社四君子之间的关系问题；（2）吴昌硕出任社长的问题；（3）马衡出任社长的问题；（4）关于春秋雅集及题名问题；（5）西泠印社与其他印社的关系问题；（6）新中国成立初的西泠印社恢复问题；（7）张鲁庵捐献印谱问题；（8）关于《西泠印社志稿》编撰问题；（9）西泠印社六十社庆筹办问题；（10）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问题。^②对于上述议题，我们要回到历史场域，探究其真相，发掘其内涵。同时，在问题意识的聚集中形成新的问题域，以此推动西泠印社史的研究。

当然，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不仅考虑到“印学内部”问题，而且考虑到“印学外部”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层面：（1）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学科边界和研究范围问题；（2）印学脉络的溯源与勾勒问题；（3）文献资料的爬梳、解读与分析问题；（4）学科交叉问题，尤其是与金石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关系问题；（5）研究立场以及理论体系建构问题；（6）拓展印学研究的文化维度问题等。上述问题的提出，都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形成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文献与实物的良性互动，使得“大印学”的学科属性得以彰显。

（二）历史意识

所谓历史意识，就是把当下发生的现象放在时间长河中去考察它的源流和变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

^① 陈振濂：《西泠印社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写在西泠印社115年社庆之际》，《西泠艺丛》2018年第9期，第4页。

^②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148页。

品”^①，把“历史的”置于首位，强调文艺批评和创作要树立大历史观，正确认识、理解和阐释文艺作品的历史镜像，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揭示文艺作品中“历史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活力。

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其建立与历史的联系和进入历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编写《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召开国际印学峰会和专题学术研讨会，以及举办系列展览活动进行的，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感。综观近20年学术会议，可以发现，西泠印社以“史”命名的学术专题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印学史研究、印谱史研究和西泠印社史研究。概括地说，这三个方面还包括一些内容，比如印学史研究包括印学文献研究、印学观念史研究、印人研究等；印谱史研究包括印谱著录与出版、印谱与文献研究等；西泠印社史研究包括社史研究、社员研究、史料介绍与人物回忆等。2022年11月，西泠印社举办“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选题包括古印收藏史研究，以及文人篆刻收藏、印学文献与印具印材收藏史研究等。可以说，西泠印社在印学研究中能够感知历史，在大历史观中构建“大印学”。

以陈振濂先生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为例，他以“导论”代“前言”的方式，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中，勾画了百年西泠的发展脉络，甚至还探讨了建构“西泠学”的宏伟蓝图，并催生出“西泠印社与篆刻理论史或印学史”“西泠印社与金石学史”“西泠印社与近代学术史”等20个学术课题。这些学术课题以西泠印社为中心，将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体现出历史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西泠印社还与诸多文化领域相交叉，体现出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可以想见，历史感是历史意识的基础和前提，西泠印社在贯穿古今的历史中考察、探究印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绝不仅仅是掌握史料这么简单，而是在于运用历史思维视角与方法审视之，凸显历史意识的力量。

（三）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通常指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发展状况的认识和觉解。时代意识既源于时代现实，又影响和引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理性自觉。陈振濂先生言：“要拓展印学领域，走向‘大印学’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②从历年诸多研究专题来看，西泠印社并没有拘囿于传统印学的研究，而是聚焦时代、关注现实，把印学研究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在大胆探索中继承发展，体现出前瞻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

首先，立足于传统印学之基。中华民族艺术自身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西泠印社从百年社庆开始，着重于打造高端的国际印学峰会和专题性学术研讨会，在选题方面重视传统印学研究，比如印学史研究、古玺印研究、篆刻流派与创作研究、印人专论等。其次，注重传统印学的创造性转化。西泠印社善于发掘内在的且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对印章和篆刻创作里面局部的、细小的技术环节进行提升，把它们和碑帖学、金石学、传拓学等相联系。比如，印谱史、金石书画与鉴藏、金石全形拓等方面的研究，在实现传统印学延续的同时使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②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3页。

其具有现代性的内涵。最后，关注世界印章，促进印章式“文明交流互鉴”。比如，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举行，西泠印社紧抓机遇，并结合“城市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倡导“域外印章研究”。2018年，举办“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见，西泠印社立足新时代、新方位、新坐标，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进行双视角的文化观察，既有内向思考，又有外向拓展；既有世界眼光，又有战略眼光。此外，陈振濂先生就“大印学”锚定三大发展定位：“第一，印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第二，和西泠印社的百年发展有关联；第三，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发展相一致。”由是观之，他把“大印学”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和文化前沿。

（四）学科意识

学科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学科意识关乎学科理念，是在现代学术眼光观照下的有意行为。为了增强学科意识，就必须正确认识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历程，对该学科的性质、培养目标、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以及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要认识到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以此构筑系统性、完整性的知识网络，培养学科综合能力。

沙孟海先生有着很强的学科意识，1963年他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题为《印学的发展》的发言。^①同时期，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正式成立“书法篆刻科”，他受邀担当“印学史论”课程。^②无论是作印学发言还是教授印学史论课程，沙孟海先生的学术范围都是聚焦于“印学”展开，此与西泠印社“研究印学”的宗旨一脉相承。如前所述，西泠印社八十周年社庆，沙孟海先生在祝辞中提到应区别“金石学”与“印学”，不宜混用“金石学”，当时遇到社中长老如朱复戡等的疑义，有相当的社员也表示不理解与不习惯。^③在今天看来，沙孟海先生在推动印学学科独立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体现出其作为一社之长的大师风范和作为。可以说，在百年社史中，沙孟海先生为印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1997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的重点是关于篆刻学科建设，确定了以篆刻艺术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一个大的“篆刻”的学术概念来作为会议的学术定位的话，那么时隔20多年，陈振濂先生又提出“大印学”概念，这是关于印学学科体系的构想，显示出其对于印学历史文脉和知识谱系的清晰认识，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性上升。

倘若西泠印社的印学学术意识源于一种“力”，那么问题意识是活力，历史意识是动力，时代意识是张力，学科意识是合力。有充沛的活力，才能增强动力，扩充张力，凝聚合力。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织出了百年西泠美丽的锦缎布匹，织就了“大印学”的新理念、新格局和新体系，从而激发了印学研究的内驱力。

① 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444页。

② 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448页。

③ 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44页，注释3。

四、结语

一个学科的诞生、演化与发展，是基于人们对该学科的认识、探索的结果。从篆刻到印学再到金石学再延伸到“大印学”，必然伴随着在学术研究上的特殊需要，这不仅是西泠印社在推进印学研究工作中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也是思想文化建设、学科建设的时代精神表达。综上所述，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由印学基础理论与篆刻技法研究、印学交叉学科研究以及西泠印社史研究三大板块组成，以此为支点，在宏大的视野中确立了自身研究对象，不仅具有学术标本意义，而且具有历史标本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西泠印社立足传统印学，同时不断拓宽视野，敏锐地把握现实性与学理性、前沿性与基础性的关系，诸如“保存金石”与呼吁“重振金石学”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研究印学”与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兼及书画”与提倡“诗书画印综合（兼能）”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①这是一种蕴古含今的探寻，也是契合时代发展所需。不止于此，西泠印社还因为具有自觉的、鲜明的、深刻的学术意识，把问题意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学科意识处在动态的关联中，从而让印学研究超越时代的局限，最终成为有温度的探究、有态度的学术、有深度的理论和有高度的思想。

（作者系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①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新刊前言，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